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法国汉学研究丛书

FAGUO HANXUE

YANJIU CONGSHU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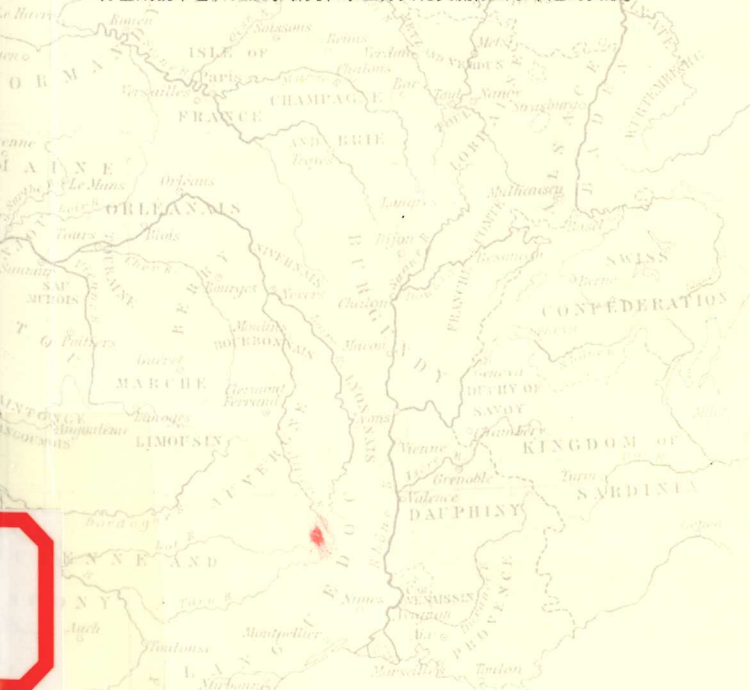
郑炳林 主编 / 耿昇 译

法国敦煌学精粹

ESSENCE OF FRANCE

DUNHUANG STUDIES

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被西方泛归为汉学范畴。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研究执牛耳者，法国学者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汉学研究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1491091

Essence of France

Dunhuang Studies

法国 敦煌学精粹

郑炳林 主编 / 耿昇 译

①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94091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10018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敦煌学精粹 / 郑炳林主编; 耿昇译.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6-03911-3

I. ①法… II. ①郑… ②耿… III. ①敦煌学—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823 号

策划编辑:李树军 马 强
责任编辑:马 强 赵宝红
美术编辑:马吉庆

法国敦煌学精粹

郑炳林 主编 耿 昇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30.125 插页 6 字数 81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226-03911-3 定价(共 3 册):150.00 元

法国汉学研究丛书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因此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法国敦煌学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关注。从伯希和起,法国敦煌学研究一直领先西欧诸国,出现一批敦煌学研究的著名专家,有从事汉藏佛教关系研究的戴密微,从事敦煌经济史研究的谢和耐和童丕,从事敦煌文化史研究的戴仁、茅甘和侯锦郎,从事壁画研究的苏鸣远,从事研究人数之多,涉及领域之广泛,研究水平之高,都是西欧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将法国敦煌学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敦煌学界方面,耿昇先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大部分人研究中接受、利用法国敦煌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借助于耿昇先生的译著。目前敦煌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探讨百年来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今后敦煌学研究发展的方向,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展起来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中最难点,是对国外敦煌学研究状况的总结和展望。耿昇先生的研究工作,就处在这项工作的最难点,也是制高点。耿昇

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师长，在我大学毕业的 1981 年底就认识了他，他对学术研究的热衷和执著是我们每个人无法比拟的。他不仅致力于法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同时还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史的研究上成绩卓著，他的成果是我们从事这些研究必须参考的论著。耿昇先生十分关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发展，并兼职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基地重大项目《法国敦煌学研究成果译介》(10JJD770017)，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法国汉学研究丛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 211、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兰州大学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发挥了引领研究发展的作用。

学术交流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未来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目前已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敦煌学研究所还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台湾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签署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双方就联合培养学生、合作办会等达成了初步意向,促进了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举措便于同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等多种手段加强敦煌学资料的建设工作。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建设始于1982年,1985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但是大规模的建设是在1999年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批准之后。经过多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等大型图书)以及已经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目前敦煌学研究所拥有7万余册专业图书,基本上保障了敦煌学研究的需要。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以期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人才培养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亮点,利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2010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4人,毕业博士54人,14人晋升教授,其中5人任博士生导师,20人晋升副教授,36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7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

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1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所里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这些经过培养的日本留学生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产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2007年毕业的韩国留学生徐勇完成了《敦煌壁画材料研究》,是第一位外籍敦煌学博士,此前的2004年台湾地区杨明芬也以题为《唐代的地方净土礼忏法研究》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与日本朝日新闻社联合培养的敦煌学研修生,从1998年起共培养了30人,另外还为中国台湾地区培养了多名研修生,既加强了国际间的敦煌学交流,也为国外培养了敦煌学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将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研究的优势互补体现出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中心。

在学术研究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了一批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100多项,经费800多万元。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

座”丛书。其中“国际敦煌学丛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规划重点出版图书,获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研究专著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项,4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评审中获得优秀;获甘肃省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图书2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研究”,主要对百年来国内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人力对国外敦煌学研究史进行研究,将国外的研究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译介,供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因此耿昇先生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法国汉学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将法国汉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敦煌学界,供中国敦煌学研究之参考,而且具有总结展望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史,指导中国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意义。

2010年12月

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代序)

耿 昇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余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特别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以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大历史背景作以介绍,以飨我国学术界。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缘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和敦煌劫经,是当时国际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间,俄、英、德、瑞典、美、芬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早一些。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借助于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对新疆侵扰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



1834 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派约翰逊(W.H.Johnson)于 1865—1866 年考察于阗,派沙敖(R.B.Shaw,邵乌)于 1870 年考察叶尔羌与喀什,派佛塞斯(T.D.Forsyth)及其同伴于 1873 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英国探险家贾斯理(C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eish)稍后于 1886—1887 年也前往同一地区搜掠文物,鲍尔(Bower)少校利用追捕杀害达格莱什的逃犯的机会而于 1889 年到达沙雅。但这些英国人直到此时仍未考察清楚,究竟应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于 1900—1901 年第一次西域探险为止,这种无知局面才略有改观。早就对中国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国,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尔斯基(N.M.Przevalski)于 1870—1885 年 4 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进行考察。1885 年,格伦伯切夫斯基(B.L.Grombchevskii)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 年间,佩夫乔夫(M.V.Pevcov)、罗博罗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达诺维奇(Bogdanovič)和柯兹洛夫(P.K.Kozlov)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帝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Ya.Ya.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列宁格勒)博物馆。贝林格(Belinko)和帝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夫(G.Kolokolov)则将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 1891 年 11 月 28 日的会议纪要,而向彼得罗夫斯基发去了一份有关在喀什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科学考察的调查提纲。帝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是在 1897 年派出由克莱门茨(D.A.Klementz)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发掘工作。瑞典人斯文·赫定于 1890—1902 年间三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Grunwedel)、胡特(Huth)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 1902—1903 年首开四次大规模西域探险之先河。由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此前后到达塔里木盆地。

这些考古探险团都大肆非法发掘、采集、收购、骗取和盗窃了大量中国西域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其目的仍然是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

在西方和日本竞相向中国西部派遣考古探险团的热潮中,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和尤为注重文化争夺的法国却姗姗来迟。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也有几名法国旅行探险家曾先后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于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于1889—1894年、沙畹(E.Chavannes)于1907年、古伯察(E.R.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于1843—1845年,多伦(d'Ol-lone)于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Orléans)于1895—1896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区旅行探险。虽然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但搜罗的文物与文献却价值不菲。因为等到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虽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国仍出奇招而获得了高价值的文物。

西方列强在西域的科考与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和考古发掘点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为了在西域从事更加系统而广泛的考察,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西方列强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应运而生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惯用的划定势力范围的老伎俩。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年)任主席。塞纳尔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他年轻时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别是“北宗



佛教”的吸引,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曾出版过有关巴利文语法、印度文碑铭、印度种姓制度、《正法华经》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论著。他从 1882 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同时又受聘为意、比、荷、俄、德诸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 30 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动,同时又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所以,正是他积极提议和鼎力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率团赴西域考察,参加这场国际大角逐。

法国的既定目标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国际大竞争中,法国必须占有与其国际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额。伯希和的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在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多门亚洲语言并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项目;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负责拍摄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保管。整个探险团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提供赞助。诸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那样的一批学术团体,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先生本人那样的一些热衷于赞助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也都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归伯希和支配,从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置于一位大旅行家奥尔良的名誉保护之下。其实,伯希和于 1901 年刚从越南西贡医院出院的那天,奥尔良王子恰恰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医院,这既是一种巧合,又是一种“天缘”。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匆忙组建起来并兴冲冲地出发赴西域,进行了近三年的考古探险活动。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团首赴喀什地区与图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

工作。他们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离开法京巴黎,踏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10天的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货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突击学习东突厥语。因为作为语言学家的伯希和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习过这种语言,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

伯希和一行乘火车前往安集延,他们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缓缓行进,那里盛产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宝藏。8月11日,他们到达距安集延只有10余公里的奥希(Och),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哈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Emil Mannerheim,马达汉于1939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1944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马达汉实际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以刺探中国西部军情和掠夺文物。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达哈什。

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间,率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匹就多达24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尔克孜牧场前进。伯希和还曾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柯尔克孜女王公之子阿塞姆(Assam)有过一次颇具学术味道的对话。伯希和一行最终从伊尔凯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过俄中边界,再经过20天的旅行,最终于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这是他们计划中于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将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国领事馆的一座建筑物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Macartney, 1867—1945年,为1793年出使中国的英使老马戛尔尼之孙)公爵也经常去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驮队。瓦扬声称,伯希和在俄



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中都颇有“面子”，这是伯希和以其渊博学问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而赢得的荣誉。由于其他国家的考古探险团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作过考古发掘，所以伯希和一行在那里只作过一次人类学调查。此外，他们还从事地理调查和对道路进行测绘。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喀什东北约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在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正在那里逗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伯希和一行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四个重点目标上。

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喀什的一处名胜。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做过考察。但不知为什么，伯希和始终称此地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误听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称是Utch—meravan或Outchmah—rav?n，意为“正在坍塌的和难以进入的三个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个也是以前唯一一个撰文描述过“三仙洞”的欧洲人，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其描述文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论丛》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处佛教古迹》。彼得罗夫斯基为配合其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从大路一侧拍摄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绘制的一幅平面图。德国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于1905年考察该洞时，其成员巴尔图斯(Bartus)曾从山崖上用绳索滑入洞内。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险时，只作壁上观而未敢冒险进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杨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1815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已被彼得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尽数劫

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的,这大体上反映了当地民族的构成。赴三仙洞参观考察的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之外,其余几乎都是兵勇。清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至11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题记写于1788年,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纪平定新疆之后竣工的,因为涂层上写有比绘画更古老的题记。

伯希和继瑞典传教士霍贝克之后,也介绍了三仙洞的开洞原因。努埃特拍摄了现在很少见的几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杨对洞子作了全面的调查,详细记录了洞口、中部、后部和左右两侧各自的长度、高度和宽度,还记下了洞内壁画内容,并录下了壁画题识和游人题记。事实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险鏖战前的一次演习。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得罗夫斯基曾提到过该遗址。1905年的德国探险团和1906年的斯坦因也都曾提到过该地。斯坦因将该地名记作Tigharman,后又改作Khakan—ning—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团使用的地图上,却做Khanl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为佛教时代(似乎是由率堵波和南墙保护的四边形建筑)和伊斯兰时代(西部的“炮台”或瞭墩以及介于炮台和四边形建筑之间那座尚未被考证清楚的建筑)的遗存。伯希和亲自率领10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chahr)遗址。彼得罗夫斯基从未讲到过此地,斯坦因对它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伊斯兰时代,但却显得相当古老。伯希和未对它做详细描述,只拍摄了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



对于喀什东北的汉诺依(Khan-? l, Khan-t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ap-tar-Kha-na)、萨喀尔墙(Saqaham)和哈萨尔墙(Hasa Tam)、“九间房”(To-qqouz-Hod-jrah)等重要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尤其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教遗址,发现了佛像残片及几枚钱币。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对三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

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率堵波”(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瞭墩)”。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留下了不太详细的记述。

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故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men)交汇处只有3公里之遥。

第三个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ill)和阿克噶什(Aqq? ch)等处。伯希和一行于炮台山作了两天发掘,在帕依纳普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年9月26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6~7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月27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Tim)以及朶哈炮台(Qaqha Tim,tim指“墙”或“率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的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一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现在均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三、伯希和探险团在图木舒克的惊世大发现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

1906年10月26日离开该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 rdeklik, 野鸭地), 在那里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 于该月28日到达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 今巴楚县)。他们于29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此地区一直停留到当年12月15日, 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沿唯一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 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 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星半点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志。当他用马鞭梢无意地扒拉地面时, 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 主要是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 缓慢地通过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而传入中国中原, 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该传播链中的一个大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希和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实际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oqqouz-Sara?, 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这项发掘工程以每天使用25—30名民工的发掘速度展开, 共维持6个星期。他们对该遗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测绘, 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他们在发掘后期, 还发现了一块类似浅浮雕陈列馆的地方, 浅浮雕虽已变得坚硬易碎和残损严重, 但仍不失其宏大气魄。它们揭示了在7—8世纪期间, 把中国西域与由印度—斯基泰国王统治下的犍陀罗艺术密切联系起来的纽带。伯希和发掘到的文物运往法国后, 先在罗浮宫展出, 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馆, 曾使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1906年9月至12月12日之间, 伯希和保留了一部宝贵的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

图木舒克(Toumchouq, Tum? uq)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鸟喙”, 后来用于指崎岖不平的地势, 具有指“岬角”的意思。图木舒克村庄也确实是向南于喀什河与叶尔羌河的沼泽山谷方向延伸的岬